

# “疾控国家化”的媒介呈现:疫情报道中战争隐喻的文本分析

□ 宋素红 陈艳明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22)02—0035—5

**【内容提要】**作为媒体话语实践,战争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还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主流媒体运用战争修辞来报道疫情,形成了结构性的战争隐喻系统。战争隐喻触发了国家化的防疫、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紧急状态的相似经验,并呈现了国家权力的在场。同时,媒体通过隐喻,在宏观层面建构出一套刚性的战争隐喻框架,在微观层面运用情感传播策略营造出温情的隐喻框架。战争隐喻内蕴了丰富的政治潜能与文化意涵,它不仅呈现了疫情防控的国家化,也表现出中国抗疫实践中媒介话语的独特性。

**【关键词】**主流媒体;新冠肺炎疫情;战争隐喻;疾控国家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统主流媒体因在获取疫情资讯和行政部门相关信息上具有相对优势,成为公众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观察疫情期间主流媒体报道中的语言现象,高频出现的军事用语值得关注。“战疫”“前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表明疫情期间的媒体报道广泛存在着战争隐喻。

## 一、文献回顾:隐喻与战争隐喻

(一)隐喻: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相伴而行

隐喻被定义为“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是直接命名生命经验或新生事物的必要手段,<sup>①</sup>在本质上是“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映射的结果”,前者称为始源域,后者是目标域。在日常概念系统中,除却可用“直接身体经验”感受到的概念,其余都是“隐喻性概念”。但“隐喻之所以能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人的概念系统中存在隐喻,”因此,“隐喻首先是思想和行为问题,语言问题仅是派生问题。”<sup>②</sup>对于某些并非“现成”的事物属性,我们须借由另一“现成”的、具有明确形式化指引的事物予以认知,亦即“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使尚未成形的经验得以成形、得以言说。”<sup>③</sup>因此,隐喻这一转换机制中的“喻体”,与其说是帮助认知者理解陌生的“本体”概念,不如说是内在地规定了待认知的概念。当战争隐喻被用于防疫后,疫情防控的局部措施和整体部署就可以更好地被公众理解。另外,也正是战争“确定”了疫情防控的动员方式、社会氛围和部署举措。

隐喻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依靠两事物在整体上的相

似性,即作为“经验完形”的相似来建立关联。<sup>④</sup>相似性虽受文化背景制约,但也有明显的主观成分。易言之,隐喻的映射机制具有主观建构性,不同意识形态所引导和制约的隐喻各不相同。因此,作为过程的隐喻受到意识形态的选择,作为结果的隐喻同样表征了意识形态。<sup>⑤</sup>对于结构性隐喻来说,这种建构还体现在隐喻遮蔽了概念的某些属性,而强化了另一些,反之亦然。无论遮蔽或强化,都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筛选,隐喻和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相伴而行,“语言的‘权力’正是‘隐喻的权力’”。<sup>⑥</sup>

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现实是由日常的隐喻概念建构的,且“新隐喻有创造一个新现实的力量”,故考察隐喻的关键并非识别本体与喻体是否真的相似,而是着眼于“伴随隐喻而来的认知和推理,以及隐喻所批准的行为”,<sup>⑦</sup>这样才能洞悉一个隐喻被使用的真正意图与后果。对此,诺曼·费尔克拉夫也注意到,“当我们通过一个特定的隐喻来表示事物时,我们是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建构我们的现实。”<sup>⑧</sup>

(二)隐喻:构成新闻框架的重要元素

隐喻概念借由凸显或遮蔽结构性概念中的某些范畴,从而强化概念的某一属性,形成思维认知中的“隐喻框架”,在新闻报道中即“新闻框架”。威廉·甘姆森认为新闻隐喻是构成“新闻框架”的重要元素;鲍德温·范高普则发展出“框架包裹”的“架构分析”,把隐喻视为框架装置的构成要件,<sup>⑨</sup>其具体表现是,新闻隐喻重新框架了情节结构和故事安排。台湾地区政治新闻的“道路隐喻”为民众提供了看待政治人物与政治情境的新视野。<sup>⑩</sup>在特定文本中,隐喻总是围绕在“修辞意图”

**【作者简介】**宋素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艳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周围,<sup>①</sup>如我国西北地区的媒体利用“团结花”“石榴籽”“连心桥”等隐喻,以构筑多民族团结的“拟态环境”。<sup>②</sup>而战争隐喻是新闻报道中使用较为频繁的隐喻类型,在大事件报道中尤为明显。我国媒体报道“SARS十年”的基本框架是战争隐喻,<sup>③</sup>“汶川地震十年”纪念报道中,战争隐喻同样被用于情感动员,以召唤团结一心的国家与民族精神。<sup>④</sup>

### (三)疫情中的隐喻传播

此次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建构起战争、比赛等多个隐喻框架,以嵌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特色文化叙事。<sup>⑤</sup>战争隐喻被认为有助于构筑统一的防疫认知体系,并实现舆论引导功能;对媒体而言,战争隐喻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的速率。<sup>⑥</sup>乡村的硬核抗疫宣传标语再制了官方的防疫知识,<sup>⑦</sup>并通过共情、归咎、说服等多种策略,辅之以隐喻,营造出“大敌当前的战争”这一认知心理空间。<sup>⑧</sup>

疾病既是始源域,也会扮演目标域的角色。新闻报道将疾病的防治隐喻为战争,但疫情期间,疾病的另一重面向同样值得关注。苏珊·桑塔格发现,疾病本身会被隐喻化,附着在疾病上的是某种道德评判或政治态度,且疾病的隐喻还会相互纠缠。<sup>⑨</sup>新冠病毒作为始源域被附着上诸多政治角力的隐喻意涵,它被部分国家操弄为污名化中国的手段,生产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隐喻,将公共卫生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sup>⑩</sup>其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问题也随病毒隐喻的传播而潜滋暗长。<sup>⑪</sup>

## 二、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战争隐喻不仅是简单的语言现象,更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本文从隐喻的认知理论入手,以疫情期间主流媒体报道为分析文本,考察战争隐喻的使用及特征,战争隐喻如何在历史经验与抗疫现实之间穿梭,以及战争隐喻对疫情防控的意义,探究这一隐喻类型如何架构起不同的话语发挥其认知效果,以尝试探索中国抗疫实践中媒体话语的独特性。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及其新媒体平台的疫情报道,以及广东、河南、浙江、湖南、安徽、北京、江西等地省(市)委机关报<sup>⑫</sup>(因这些地方在疫情早期的确诊人数较多)的疫情报道进行分析。主流媒体担负宣传的使命和舆论导向的基本功能,<sup>⑬</sup>其报道文本更能彰显战争隐喻的使用意图与意识形态,而且在对军事化话语的使用中,主流媒体发挥的影响比其余媒体更大。<sup>⑭</sup>本研究所选择的文本主要分布于两个时段:一是2020年1月21日至4月9日(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媒体开始大量报道与疫情相关的新闻),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各通道的封锁;二是2020年4月9日之后,新闻报道分析战争隐喻的历时性影响。

在获取文本之后,首先对相关新闻报道文本进行隐喻识别;其次采用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揭示隐喻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其基本操作框架包括隐喻识别、隐喻阐释、隐喻解释,<sup>⑮</sup>通过甄别文本中的隐喻及其对应的始源域和目标域,探寻其背后的认知意义,并结合跨域联结的经验,解释隐喻为何能够发生,进而分析各隐喻之间、隐喻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结合话语的社会实践,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 三、战争隐喻的表现形式: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的本体和喻体间的映射具有规律性、结构性对应关系,<sup>⑯</sup>体现为隐喻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疫情报道的战争隐喻表现出结构隐喻的特征。“防疫”即“战争”的隐喻命名策略<sup>⑰</sup>将疫情防控定义为“战争”,设置了解疫战争的战争框架。疫情报道的诸多表述都与战争的四个次范畴相对应(见表1),构成了一个系统连贯的隐喻结构。

表1 疫情报道的战争隐喻类型

战争类型-防疫规模	人民战争、整体战、总体战、阻击战、攻坚战、大会战、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战争人员-防疫人员	战斗员、铁将军、白衣战士、战地记者
战争行为-防疫措施	请战、请缨、作战、抗击、阻击、狙击、冲锋、冲锋陷阵、厮杀、歼灭、突击、奋战、斗争、指挥、执甲、出征、驰援、支援、决胜、打赢、全胜、打硬仗、拉响警报
战争空间-防疫场所	战场、微型战场、安全墙、火线、一线、防线、战斗堡垒、战斗桥头堡

战争隐喻划定了不同地区的作战层级,借以凸显不同地区疫情的严重性,构成了不同的战争类型。国家层面的防控措施被隐喻为“攻坚战”“总体战”,武汉及湖北省其他重点区域的防控措施被隐喻为“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未获战争命名的地区,则通过历史资源赋予当地防疫以特殊意义。《河南日报》借用长征中的“娄山关战役”“腊子口战斗”<sup>⑱</sup>来命名当地的防疫举措,这两场战役的共同点在于突破了天险关隘而被视为长征的重要节点。媒体借用历史事件,激活长征这段集体记忆,隐喻映射现实、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战争隐喻将与防控疫情的相关人员都隐喻为“战斗者”,在媒介话语上被建构为“作战主体”。“这里没有教授和医生之分,没有护士长和护士之分,在这里大家都是战斗员,”<sup>⑲</sup>“《河南日报》杨晓东正在武汉探亲,秒变战地记者,”<sup>⑳</sup>而女性防疫人员则被隐喻为“巾帼英雄”。

战争行为将疫情防控的所有措施都隐喻为战争手段。战争行为的隐喻分为两类:一是将某一具体行为命名为与战争相关的举措。“请缨战疫的四姐妹正式就位,开展咽拭子标本采集,”<sup>㉑</sup>“罗春梅和唐棠终于等来了出征命令,在开赴一线的途中,两人收到前方3位战友发来的信息。”<sup>㉒</sup>媒体将主动参与一线防控的行为隐喻为“请缨”作战,将各地医疗人员援助武汉之举喻为

“增兵”与“出征”；二是将防控疫情的总体措施隐喻为战争行为。“全省医务工作者和援鄂医疗队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动、勇挑重担，”<sup>③</sup>这段引文密集地使用了高度隐喻化的战争修辞以概述医疗人员的防疫行为。“战斗”的命名赋予常规医疗行为以迫切性、激烈性，在情感上更具张力，易引起受众注意，以提高警惕心。<sup>④</sup>

媒体还将防疫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都隐喻为“作战空间”，将二者纳入一体化的防疫“作战”区域。“这个春节，夫妻俩无暇照顾家中的父母和3岁的儿子，坚守在各自的战场上。”<sup>⑤</sup>医院承担防疫主力，被隐喻为“战场”；通过战争空间隐喻，将家庭私人空间纳入“战场”之中。同时，空间隐喻动用高一低、前一后等基本空间关系，如医院是“一线”，家庭是“后方”，两者的对比体现了防疫重要性的差别。党员、群众、社会单位等被共同隐喻为“防线”，这一宽泛的能指将社会各领域都动员为“战疫”的空间。在个体化加剧的社会背景下，战争空间的隐喻推进了防疫的集体化。<sup>⑥</sup>可以说，战争空间隐喻造成了“处处皆战场”的拟态现实。“战争”被日常化，疫情防控行为也变得更加常态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众保持防疫意识，促使他们将心理认知转化为防疫举动。

在疫情之初，媒体报道中已出现“战胜疫情”<sup>⑦</sup>“没有硝烟的战役”<sup>⑧</sup>等战争修辞，将疫情防控界定为一场对病毒的“战争”。随着疫情发展，战争修辞逐渐铺陈为一组系统性的结构隐喻。隐喻在被认知时需要遵循自洽原则，即隐喻使用者须自主整合、协调概念方可接受隐喻。<sup>⑨</sup>上述次范畴结构将“战争”拆解为更具体的元素，令其更趋丰富、自然，也为接受者整合战争隐喻概念提供了素材库，使隐喻更易被接受者认知，从而促进了“战时状态”这一整体概念的接受。

#### 四、战争隐喻的理据：中国防疫实践的经验性

战争与防疫之间形成隐喻的理据，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经验完形”的相似性。使用战争隐喻凸显“对立认同”，给予病毒以敌人般的痛恶，塑造出“敌我对立”的语境，疫情防控由此被建构为“战时同盟”的抵抗过程。由此，战争隐喻发挥了疏导社会焦虑、缓和社会矛盾的治理功能。<sup>⑩</sup>除了上述心理认知层面的解释，理解战争隐喻还应考虑到中国防疫实践的经验事实，以及“防疫即战争”隐喻中的经验性理据。

##### （一）战争与防疫的行动主体契合

战争的主体通常为国家，战争和国家的形成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在国家政治领域中，战争本身不是修辞，而是象征着国家起源的重要话语。防疫亦为国家之责。现代国家不仅要提供各种公共品，而且承担了公民就业、社会福利、生老病死等各方面责任，二者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内容。<sup>⑪</sup>

此次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sup>⑫</sup>化解危机、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就成了国家的责任。各级卫健委、疾控中心等直接负责传染性疾病预防，实现了“疾控的国家化”，而国家机构中公务人员的出动则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出场。在战争人员的隐喻中，媒体使用大量篇幅报道一线的防控工作人员，将其塑造为“战士”，同时挖掘各行业的“英雄”。《人民日报》“一线抗疫群英谱”、《湖北日报》“党旗飘扬抗疫一线”等专题报道更是浓墨重彩地挖掘了一系列典型人物。无论是一线医护人员、民警、军人，还是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等，大都可被视为国家权力在具体领域的“代言人”。将这些公务人员隐喻为作战主体，就使得“国家”这个抽象概念成为战争背后真正作战的行为主体。

##### （二）话语动员与“战时状态”

疫情不仅深刻挑战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sup>⑬</sup>疫情发生后，防控疫情成为各部门的工作重心，高强度的防疫节奏被建立起来，并形成“疫情即战争”的舆论声势，以全面动员民众。而战争同样依赖于结构性的组织动员能力与一个使战争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或官僚制，就无法有效地推进战争，<sup>⑭</sup>其原因在于组织能有力动员人力资源，将行政、武装部门转入战争轨道，以配合战争需要。因此，战争与防疫在动员层面构成了相似性的“经验完形”。

战争人员的隐喻是组织动员在媒介话语中的反映，它赋予防疫工作者以“战士”“英雄”的身份，最大限度地调动多主体参与疫情防控。战争隐喻不仅有助于通过话语进行动员，还将防疫隐喻为“战时状态”。该状态的实质性特征在于，国家的权力临时集中于特定的中央或地方机构，公民的部分个人权利受到限制。<sup>⑮</sup>政治权力作用于生命，更让个体空前地面临到政治哲学意味上的“例外状态”。<sup>⑯</sup>无论是生活的直接感受，抑或哲学层面的生命反思，都将疫情防控指向特殊的社会状态和生命形态，这就是被媒介话语命名的“战时状态”。《“战时”状态要有“战时”作为》，以战争隐喻对湖北当地的党政干部提出工作要求，<sup>⑰</sup>而它在现实中所对应的，正是上述诸种非常的行政之举。

防疫举措与战争经验互构，具体的防疫过程——国家发起、组织动员、宣布战时状态体现了战争式、军事化的行为风格，战争隐喻反过来令使用者将防疫带入上述战争框架中。这与新中国历史上战争与防疫互构的渊源分不开。建国之初，传染较广的结核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等被视为帝国主义危害中国百姓、损害人民健康之举，消灭疾病即是消灭“政治敌人”。<sup>⑱</sup>因此，医疗层面的“战争”不仅隐喻了疾病防控的举措，也包含了“克敌制胜”的意识形态内涵；1952年2月，美军在

朝鲜战场上空投带菌害虫,全国掀起了以反对美军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sup>⑧</sup>地方政府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各阶层群众情绪高涨地投入其中。其后,以群众运动为基本工作方式、遍及全国城乡的疾病防控进一步常态化。“国家化”与广泛的社会动员演变为新中国面对疾病与卫生的惯常对策,这使得战争隐喻与卫生防疫的关系日益密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卫生事业的技术化,发起卫生运动已不再必要,<sup>⑨</sup>但运动的策略与形式却有所保存。当面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诉诸集体式的防疫、群体性的动员,并将卫生防控上升到“战争”层次亦屡见不鲜。

在西方语境中,战争隐喻的使用通常被认为带有负面效果,如蒙哥马利认为,军事隐喻是通过激发恐惧的感觉从而促使公众采取防御性的医疗行为。<sup>⑩</sup>具体分析中国在地防疫实践,就会发现这一解释的说服力不足。在中国,与其说战争隐喻与防疫的相似性体现在恐惧等心理认知层面,不如说它来源于具体的卫生运动历史与疾控的集体记忆。在我国疾控史上,国家、组织动员、高度紧张的防疫状态相互交织、密不可分,作为修辞的战争隐喻正是指向了这一中国特色的防疫过程。一旦政府和主流媒体启动这一隐喻,就意味着其所对应的事件被纳入了高度政治化的进程中。从这一角度来说,战争隐喻不仅是媒体面对疫情报道时下意识选择的宣传修辞,更是反映了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处置应对的经验习惯。由此,战争隐喻既是媒体的新闻修辞,也是从历史中沉淀而出的政治修辞。

## 五、战争隐喻: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的媒介呈现

### (一) 隐喻的启动与危机治理

战争隐喻诞生于重大的社会危机中,这场危机指向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对个体而言,未知的疾病威胁人的生命安全,构成生存危机;对社会而言,为防控疫情,社会流动性不得不减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对国家而言,疫情在公众舆论与社会治理方面都构成挑战。疫情暴发之初,官方采取初步应对措施,一些疾控单位成立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启动紧急监测,<sup>⑪</sup>但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公众在初步感知疫情风险的同时难免产生焦虑、不安情绪。另外,疫情暴发冲击了常规的治理机制,构成了国家治理在卫生疾控领域的挑战。因此,国家一方面有必要开启特殊的疾控治理;另一方面以危机管理的方式,利用媒体对社会进行引导与控制。<sup>⑫</sup>

在这种语境下,重新审视战争隐喻的诞生,便不妨将战争隐喻的启动理解为国家治理的媒介信号。由于国家、战争、组织动员与医疗防疫的“亲缘关系”,当公众感知到防疫被定义为“战争”时,便能激发相似的历史经验与集体记忆,从而领会到即将开启的紧急动员、

集体防治等诸多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战争隐喻的出场不啻为国家权力在场的证明,它不仅回应了公众的焦虑情绪与舆论质疑,同时也暗示了一场危机治理实践的开始。

### (二) 战争框架:在刚性与柔情之间

疫情暴发后,疫情防控工作成为社会生活的重中之重,媒体不断衍生的战争修辞内部发展出两个充满张力的框架:刚性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充满人情味的“柔情之战”。

媒体使用多种战争隐喻修辞,将看不见的治疗过程建构为看得见的、清晰易感的“战争”,进而将整体的、宏观的疫情防控建构为消灭疫情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些修辞既包括泛化的军事用语如“作战图”<sup>⑬</sup>“用药如用兵”,<sup>⑭</sup>也包括文学化修辞如“征衣不解”<sup>⑮</sup>“战鼓铿锵”,<sup>⑯</sup>此外还运用“不破楼兰终不还”<sup>⑰</sup>“修我甲兵,与子偕行”<sup>⑱</sup>等战争诗词,来叙写防疫过程与人员心理。隐喻修辞相对普通的报道语言更具感染力,媒体借此表现雷厉风行、激烈焦灼的战争之举,也营造出同仇敌忾战胜疫情的“战争”气氛,有利于号召和动员公众。

媒体调动多种报道手段,展示了一场饱含温情细节与感人事迹的“柔情之战”。近年来,主流媒体在“重夺麦克风”的过程中,善用情感传播策略,重塑“有温度”的媒体形象。<sup>⑲</sup>“温情”报道与宣传的政治要求不无关系。此次疫情中,党中央要求媒体“广泛宣传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sup>⑳</sup>在宏观叙事的同时,媒体也致力于微观的情感叙事,其具体策略有三:第一,运用平民主义<sup>㉑</sup>报道视角,看见“平凡英雄”。除了“国家代言人”之外,战争主体的隐喻也赋予了普通劳动者。《人民日报》的官微将外卖员、社区保安、地铁检修工等都称为“战疫一线”的“战斗者”。主流媒体关注普通劳动者,冠之以“英雄”“战斗者”的隐喻,折射出平民主义视角。战争隐喻发掘了社会各领域为防疫作贡献的工作者,不分性别、职业、阶层,均被赋予相同的隐喻身份。“平民英雄”的建构拉近了“战争英雄”与普通公众的心理距离,微小而平凡的坚守亦有助于疫情防控。第二,突出温情细节、悲情事迹,打造具有“人情味”的报道。媒体从多角度塑造“战疫”典型人物,既表现“英雄”的刚强,又还原平凡个体的柔情。其中,“战地夫妻”是备受青睐的报道对象,如宣武医院急诊科邢正涛白钰夫妇,<sup>㉒</sup>媒体着力表现夫妻俩共同战疫的“战友情”,以及相互关怀打气的细节。“邢正涛特意请同事将妻子与他的名字并排写在了防护服上,同时写上了大大的‘我爱你’三个字。‘这是我们最浪漫的战地情书。’”<sup>㉓</sup>简短的“我爱你”被隐喻为“战地情书”,为战疫增添了人情味。2020年2月21日的《人民日报》微博视频中,一名医生因参与防疫半月未回家,女儿过生日时也只能站在门外哽咽地为她唱生日歌。媒体诉诸父女

亲情,让网友感念这位医生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付出。第三,诉诸情感共鸣策略,引发公众同情与共情。主流媒体利用新媒体平台双向传播的特性,在挖掘典型、传递温情、设置议程的同时,也邀请网友共同参与议程、沉淀情感。“晒晒最美的她”“晒晒身边的战疫英雄”等微博话题,“众筹”了公众碎片的、零散的生活所见,让公众切身感受到与媒体报道相似的情感体验。

如果说刚性的、“硝烟味”的战争隐喻界定了防控疫情的战时性质,提高了公众对于疫情的警觉心理,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紧急动员,那么柔性的、“人情味”的战争隐喻则以情动人,促进了医护人员、一线防控人员、平凡工作者与公众之间的凝聚,以情感策略团结社会,聚合起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同胞温情。刚性的隐喻框架偏重认知效果,柔性框架则使隐喻退化为单纯的修辞手段,使“战争”的过程更趋丰满。总之,战争的两个属性看似具有不小的内部张力,但却有机地统一在隐喻表达下。

## 六、结论

战争隐喻看似是简单的语言修辞,但内蕴了丰富的政治潜能与文化意涵。透过对隐喻的思考可以钩沉出这一修辞背后的社会心理和思维习惯。

战争隐喻首先是政治话语,其次是媒体层面的新闻修辞。从隐喻的认知研究来看,战争隐喻的启动依赖于相似的经验。在中国的防疫实践中,当媒体以“战争”来隐喻疾病时,其指向正是“疾控国家化”的治理经验。因此,单从心理认知层面解释战争隐喻与防疫的关系——譬如诉诸战争可使公众产生憎恨、恐慌情绪,从而“同仇敌忾”消灭疾病——则容易落入西方语境下战争隐喻研究的窠臼,不足以解释本土的问题。

战争隐喻所触发的相似性经验并非战争情绪,而是沉淀在疾控史和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具体治理手段和疾控方式。正因为这些方式与战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之间才能建立跨域的联系。既然战争隐喻指向“疾控国家化”的防疫经验,那么在疫情始发时,政府和媒体的战争隐喻也就引出了国家权力的在场。因此,疫情报道的战争隐喻内蕴了丰富的政治潜能与文化意涵。它呈现了疫情防控的国家化,也表现出我国抗疫实践中媒介话语的独特性。然而,战争隐喻的效用会随国家治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隐喻的使用要考虑其所对应的社会语境,方能发挥效用。■

### 参考文献与注释:

- ①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 ②⑦⑧[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著,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第140页、第134页、第144页,第11页。
- ③④陈嘉映:《简明语言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第227页。

⑤林宝珠:《隐喻的意识形态力》,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⑥王一川:《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⑧[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⑨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理论亟需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6年第1期。

⑩邓育仁、孙式文:《隐喻框架:台湾政治新闻里的路途隐喻》,《新闻学研究》(台北)2001年总第67期。

⑪甘莅豪:《媒介话语分析的认知途径: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8期。

⑫王雪晔:《媒介话语动员:建构民族团结的一种策略》,《新闻界》2017年第3期。

⑬李红涛:《已结束的“战争”走不出的“迷宫”》,《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

⑭刘子琨、闫岩:《创伤、战争、起点与新生:“汶川地震十年”纪念报道中的叙事隐喻》,《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6期。

⑮张薇、汪少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刻意隐喻的认知力》,《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⑯张琳:《认知与传播中的概念映射》,《名作欣赏》2020年第7期。

⑰刘文祥:《防疫下乡、知识再制与乡村想象力》,《江汉论坛》2020年第3期。

⑱戴新月:《社会、心理、话语: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河南基层风险沟通》,《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⑲[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⑳舒绍福:《病毒污名化:隐喻、意识操纵与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2期。

㉑顾昕:《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二十一世纪》(香港)2020年第10期。

㉒即《南方日报》《河南日报》《浙江日报》《湖南日报》《安徽日报》《北京日报》《江西日报》。

㉓景跃进、陈明明、肖滨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㉔孙少晶、王帆、刘志远、陶禹舟:《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中多元媒介的微博话语表达》,《新闻大学》2020年第3期。

㉕Charteris-Black, J. (2004).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UK: Palgrave Macmillan, pp. 21-22.

㉖Meyer, M. (2001). "Between theory, method and politics: positioning of the approaches to CDA",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 27.

㉗⑩⑪⑫董林、刘雅鸣等:《必胜 中原战“疫”!》,《河南日报》2020年2月1日第1版。

㉘倪光辉、李昌禹等:《闻令出动 敢打必胜》,《人民日报》2020年2月9日第6版。

㉙李昌禹:《勇挑咽拭子采集的重任——请缨战“疫”四姐妹》,《人民日报》2020年2月15日第4版。

㉚李龙伊、陈晓霞等:《陆军军医大学护士——“五朵金花”绽放一线》,《人民日报》2020年2月20日第1版。

㉛本报评论员:《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民》,《人民日报》2020年3月12日第1版。

(下转第61页)

另一方面,未来媒体视野要求我们实现媒介融合发展思维的融合。事实上,媒介融合发展思维的来源有很多方面,如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政策法规等。这些来源不同的发展思维共同汇聚到媒介融合发展中,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发展思维层面的融合。如全媒体思维由理论研究和媒介实践共同推动形成,“四全媒体”“全媒体传播体系”等理念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发展思维。此外,其他实践领域的发展思维也会给媒介融合发展思维提供支持,如来自互联网公司的互联网思维就对媒介融合中的一体化发展理念、用户观等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媒介融合研究领域和维度的拓展,更多实践领域的发展思维可以为媒介融合发展思维提供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未来媒体视野并不是号召所有研究都体现未来媒体内涵或者媒介融合的未来路径,而是提醒研究者要注重发展时空和发展思维方面的融合,从而让媒介融合研究更适应媒介融合发展实际。

#### 四、结语

本文提出了探究新阶段媒介融合问题的三重视野,即万物皆媒视野、社会发展视野和未来媒体视野,以适应媒介融合研究和实践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这三重视野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它们都实现了对媒介的超越,共同构成了“超越媒介”的基本视野:万物皆媒视野是超越媒介形态的视野,社会发展视野是超越媒介领域的视野,而未来媒体视野则是超越媒介时空和传统发展思维的视野。此外,本文提出的研究视野并不是对已有研究视野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基于媒介融合发展实践和研究现状对各类视野的归纳、整合与升维。一些媒介融合研究事实上已经基于这些视野展开探索,但对于整个媒介融合研究领域来说,还需要将这些视野应用于研究当中。唯如此,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开展媒介融合研究,引领深度融合实践。■

#### 参考文献:

- ① 宫承波:《媒介融合概论》(第三版),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 ② 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 ③ 龙小农、陈林茜:《媒体融合的本质与驱动范式的选择》,《现代出版》2021年第4期。
- ④ 杨效宏:《新传播格局中的社会化传播规范与程序管理》,《新闻界》2018年第7期。
- ⑤ 胡翼青、杨馨:《媒介化社会理论的缘起:传播学视野中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新闻大学》2017年第6期。
- ⑥ 欧阳明、陈琛:《边界的消解与壁垒的重建:媒介融合视域下的自我认同危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7期。
- ⑦ 科学版》2020年第7期。
- ⑧ 湖北日报评论员:《“战时”状态要有“战时”作为》,《湖北日报》2020年2月1日第1版。
- ⑨ 刘绍华:《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台北春山出版社2018年版,第72-73页。
- ⑩ 肖爱树:《毛泽东与爱国卫生运动》,《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 ⑪ 胡宣:《疾病、政治与国家建设》,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 ⑫ Scott. L. Montgomery, Codes and Combat in biomedical discourse. *Science as Culture*, 2(3), pp. 341-390.
- ⑬ 《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 <https://www.yicai.com/news/100581369.html>。
- ⑭ 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
- ⑮ 王世停、王拓、王子杰:《朝着“零感染 打胜仗”的目标,前进!》,《湖北日报》2020年3月1日第3版。
- ⑯ 新华社:《最美逆行者,武汉永远记得你!》,《江西日报》2020年3月21日第3版。
- ⑰ 钟秋兰:《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江西日报》2020年3月21日第17版。
- ⑱ 张志安、黄剑超:《融合环境下的党媒情感传播模式:策略、动因和影响》,《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3期。
- ⑲ 林猛:《从疫情的报道和讨论看社会价值的转型》,《二十一世纪》(香港)2020年第4期。
- ⑳㉑ 王昊男、和冠欣、胡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护士邢正涛——一线冲锋 不负期待》,《人民日报》2020年3月5日第4版。

(上接第39页)

⑳ Flusberg, S. J., Matlock, T. & Thibodeau, P. H. (2018). War metaphors in public discourse. *Metaphor and Symbol*, 33(1), pp. 1-18.

㉑ 田豆豆、程远州等:《武汉 分秒必争抗疫情》,《人民日报》2020年1月25日第1版。

㉒ 王俊秀、应小萍:《认知、情绪与行动:疫情应急响应下的社会心态》,《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

㉓ 曲哲涵、李心萍等:《众志成城 防控疫情》,《人民日报》2020年1月24日第4版。

㉔ 李秀婷、洪奕宜:《广东拉响阻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战斗警报 众志成城战疫情》,《南方日报》2020年1月24日第A3版。

㉕ 周大军:《军语的认知研究——军语的产生、发展和理解》,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㉖ 黄芸、胡阳:《来自“对立”的认同:战争隐喻中的社会治理逻辑》,《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1期。

㉗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7页。

㉘㉙㉚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4/content\\_5482502.html](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4/content_5482502.html)。

㉛ Malesevic, S (2010). *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Viol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7.

㉜ 俞可平:《新冠肺炎危机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㉝ 蓝江、王鸿宇:《疾病、事件与治理》,《上海大学学报》(社会